

兩案—趙剛「another reality」

文：黃亞紀

趙剛作品總讓我想起莎士比亞戲劇中頻繁出現的兩案手法。莎士比亞似乎理解到世間本就複雜糾葛，真相總是晦暗難明，他在歐洲封建制度日趨沒落、資本主義興起、矛盾逐漸激化的時代，運用戲中戲、雙關語、孿生兒至角色、情節、主題的對照與矛盾，無情揭露當時社會的墮落與個人的空虛。

執念，或說糾結，是曾一度至華爾街工作的趙剛無法真正離開藝術的原因，這與他成為藝術家的三個背景階段息息相關：成長於 19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趙剛幼時經歷家族失去家產與土地，但心中沒有失去身為滿族的驕傲與自尊。1970 年代末趙剛加入中國最早的藝術團體「星星畫會」，沉浸在剛傳入西方思想與沙特等虛無主義與的叛逆時代。1980 年代趙剛赴美求學，歐美經驗帶給趙剛幾乎等同痛苦的刺激——若只出身文化大革命完全崩解的價值觀，趙剛可以是重新接受歐美信仰與美學的一張純潔白紙，但趙剛卻懷抱著巨大的自尊與使命感——這樣的趙剛經歷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種社會，體驗人性與社會矛盾的各種兩案。

在崇尚卡夫卡情節的當代藝術情境裡，趙剛與莎士比亞的親近顯得特立獨行。卡夫卡的現象世界唯有迷宮才代表真正的現實，人的肉體存在只是幻想銀幕上的投影，是一個錯誤的、沒有權利的投影，甚是錯誤到成為笑話的投影，早期影響趙剛的 Martin Kippenberger 就曾根據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說製作裝置〈卡夫卡快樂大結局「美國」〉，講述由德國來到美國的主角遭遇的各種荒誕。但有時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真實生活與卡夫卡的小說太過相像，尤其卡夫卡筆下的形象在專制社會裡更栩栩如生，這使我們感到缺乏起某種象徵或出口。莎士比亞的世界卻非如此，他寫著悲劇也容忍著喜劇，所有的角色都是替時代與悲劇伴奏，也因此人類的象徵性與悲劇的本質具有無法掙脫的關係，牽引出偉大悲劇中存在的安慰。趙剛關注的就是這種與時代相關的象徵性角色，他的作品宛如莎士比亞的獨白，2011 年趙剛於今日美術館個展「病夫」中大至八米的巨型繪畫，呈現的就是比裸體或肉體更為強烈的「人」，即使我們不明白模特兒來自東北、罹患肝炎、甲亢等背景，也會對作為人的存在狀態產生新的疑問，對究竟此時、此處、個人的意義發生新的懷疑，這是我個人最喜歡趙剛作品之處，他以一種最為簡約的形態象徵地定義一個人的存在。由此趙剛也顯現出他與 Kippenberger 的最大不同：雖然兩人繪畫主題都是多樣的，但趙剛幾乎不去碰觸 Kippenberger 經常繪製的自畫像，我認為趙剛不描繪自己並不意味著不思考自我，而更是一種大環境所造就——或許我們可以說身處時代變動中的個人，總更能夠理解渺小與憂鬱的真正含意。

也或許如此，趙剛現以中國為本，回歸自己的根本尋根。事實上中國歷史中每遇變易、文化失範之際，文人也總以史為鑒、寄情於古，孔子「克己復禮」、魏晉「竹林七賢」、唐宋「古文運動」、或趙孟頫之「古意」。起初趙剛繪畫了一些風景，逐漸地他以聽泉圖、武侯高臥圖等為對照，這些作品的真實與另一個真實同時並存，在有著邊線卻沒有邊際的繪畫空間中不斷越界游移。因為現實中國的不堪，我們開始尋找類似莎士比亞的一種距離，渴望如同莎士比亞著重人

的行為本身，而趙剛這些山水都已不再是山水，卻是人、自我在時代中的糾結表現，如果說趙剛所描寫的人物與山水極難理解，是因為趙剛極其單純地、直接地以一種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極容易體驗的方式來表現，他似乎比任何其他藝術家都要來得更偏好現實中「瘋狂的神智健全 (the insane sanity of reality)」，這種偏好說明他的作品呈現的是一個意圖、一個態度、一個令人不快又難以處理的奇怪情境的同時存在。即使我們在畫面中發現例如比例變化的差異，我們仍會感到這些表現與寓意之間沒有清楚因果、邏輯可循，而似乎更關乎一種情況、事物、動機、情感，這使得趙剛的作品在以古為本的同時，再造了似乎跟現實發生的奇狀沒有任何直接關連，卻又如此真實相關的情境。

從此處，趙剛從完全的莎士比亞連接到他藝術最重要的命題：解構。趙剛心中一直追求著可以放在當下語境中的新的達達主義。達達主義的本質是反藝術的、連結 1970 年代虛無主義的、最後卻被超現實主義併吞的。在我的認知中超現實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可分割，過去那些超現實主義電影或小說的情節已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今日成為真實，新的達達主義唯有在跳脫（超現實主義的）與現實的連結，回歸對抗更形而上層次的藝術理性。趙剛在這裡面對的是思想的兩案－西方主義的宗教與道德，與中國文化的無宗教與無信仰，過去趙剛將對抗前者的批判立場以文字直接表現在繪畫上，例如「病夫」展覽作品集首兩件作品上寫著「Utopia Intention 我們是奧地利人」、「We Petty Bourgeoisie (我們小資布爾喬亞)」，這些簡短文字充滿達達反諷價值的虛無語氣，但是面對中國的「不具有」，趙剛唯一能夠依賴的，是出自藝術家對藝術與繪畫哲學性思考的「態度」與「使命感」，這使我想起 Francis Bacon 的話，「我認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並不是試圖去表達他們自己，他們是企圖去捕捉事實，因為最終藝術家是受生命與事物的執念而讓他們去記錄些什麼，然後去找出一個系統建設一個捕捉這些東西的籠子。」

無論如何，趙剛企圖透過繪畫達到的並不是卡夫卡尋求的「不在於此」的烏托邦，卻如同莎士比亞從未想由作為一個文明中的個人離去，他對繪畫的追求與莎士比亞的哲學感知正同方向地前進著：把個人與集體的經驗灌注在一個脆弱、困惑的行動者上、悲劇的、憂鬱的、虛無主義的，他從未想要成為寓意的，卻引起種種詮釋與表達的可能。